

目 录

- 广州西关的文澜书院……………邓文正 谢仰虞 (1)
- 广州西关文澜书院的绅商活动(节录)…陈曙风 (6)
- 关于西来初地和古之花坞……………谢仰虞 (10)
- 华林寺“五百罗汉堂”被毁记……………雷永强 (16)
- 华林寺五百罗汉法号……………龚澄寓 (21)
- 陈氏书院(陈家祠)及其建筑艺术……………罗雨林 (27)
- 珍藏丰富的广东民间工艺馆……………罗雨林 (39)
- 广州第一鸡——清平鸡
——记清平饭店的发展变化……………吕汇贤提供
冯馥棠、吴国辉整理 (50)
- 百年老铺话莲香……………冯 汉 提 供
冯馥棠 吴国辉 整理 (57)
- 广东省中医骨伤科名家、著名医学教育家何竹林
……………何应华 岑泽波 黄宪章 谭昌雄 (64)
- 名医庄省躬及其《庄氏中医知新集》……………张采庵 (70)
- 西关名医古绍尧……………罗元恺、古淑庄口述
冯馥棠、吴国辉整理 (74)
- 高明的医师、慈祥的长者
——记已故广东省名老中医区金浦…梁健嫦 (77)
- “发冷丸”起家的梁培基药厂经营小史…梁尚为 (81)
- 广东广雅中学简史…………… (87)
选自《广东广雅中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文集》
- 词人陈洵……………张采庵 (99)

书法家梁鸾玲·····	崔业枢 梁 鑫	(102)
老数学家、教育家叶树荣·····	邓文正	(105)
广州“西关大屋”的的工艺和“企市”···	陈炳松	(107)
广州西关报馆街初期部份民办报馆见闻···	劳逸风	(112)

广州西关的文澜书院

邓文正 谢仰虞

文澜书院，虽名为书院，但并非是一所学校，其初原是晚清时期广州下西关地段的清濠公所。

下西关一带（指今荔湾区龙津路以南地段，即今光复中路、光复南路以西至黄沙及华贵路观音桥一带。龙津路以北地段则称为上西关。）濠涌颇多，尤以西濠，不时淤塞，涌水泛滥，淹没街道，居民不胜其苦。当地居民因推当时十三行洋商潘（敬修堂）、卢（广利）、伍（怡和）、叶（大观）四大富家揽头集资清理濠涌。其后，由士绅何太清（进士）、钟启韶、潘如彦、龚在德、颜平章、桂清槐与一些商行巨贾及四大富豪发起成立“清濠公所”。清嘉庆十五年（1810）更由何太清等报请广东布政使司、布政使曾燠核准，以下九甫绣衣坊（即今下九路肉菜市场、妇女儿童百货公司以至南方玉雕厂一带）大屋十二间改建为公所的办事房舍。这些房舍，均为洋行众商自愿送出，永为修濠公所用（又，这些房屋，除公所所需用者外，余均悉数出租取息，以充当经费。）这“清濠公所”，就是文澜书院的前身。同年，潘、卢、伍、叶四大富家，捐资将公所扩建，并定名为“文澜书院”，至是，文澜书院乃正式建立。院后，建有文昌庙，庙内有亭阁。下西关士绅，多借此以会文聚友。自此，文澜书院除仍有清濠（一般在冬季）的任务外，更多的乃士绅在作会文聚友（会文有奖）之用，逐渐遂成为西关地区著名的士绅富商活动场所。

文澜书院每年有春秋二祭的大叙会，参加的成员，都是知名的士绅和具有科举功名的生员。凡参加者，除参宴外，每人还可以得到猪肉一斤，果饼一份。六十岁以上者分给双胙。果饼于1912年后，改为茶券四角。春秋二祭的主祭官，例以翰林或进士充任。祭后，可得当时下西关有名酒家的筵席单一份（随时可用的）及烧肉数斤。此外，每年还有若干次年节的小叙会。如有新科举人、进士、翰林，以至考中秀才者，当他们将报条及硃卷送到书院时，也每会举行一次叙宴，以作为对这些书院新成员的庆贺。平时，每次会文之后，也常会搞些“壶碟会”或“大食会”。所谓“壶碟会”，乃参加会文的，每人在家里弄两碟所谓“名菜”，并携一壶酒到书院内文昌庙亭阁中会食，以比较烹调手法的优劣。“大食会”，则多是合资到当时下九甫的新林馨等酒家会食，并吟诗作对，然后尽欢而散。

由于文澜书院乃当时西关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会聚之所，用以凡能参加文澜书院活动，成为文澜书院成员者，都被认为是一件光宗耀祖之事。如终身未能青一衿，因而未能参加文澜书院活动者，每多认作为毕生一大憾事。相传，清末有位“张师爷”（名字不详），年届八十，仍是位白衣童生，每过文澜书院，必拊膺捶胸，浩然长叹。及其子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，例赠优贡，得以进入文澜书院，则又深叹“父不如子”，郁郁以歿云。

清道光末年，以至光绪年间，乃下西关科名最盛的时期。其时，由十一甫至十三甫一带，居住着历年的翰林、进士等门第不下数十家，其最著者有十一甫梁耀枢的状元第（在今大同路口）、十二甫的谭宗浚的榜眼第，以及至宝桥李文

田的探花第。因而一些人便说这地段风水好，易发功名。于是，一些有钱人家、港澳同胞、海外归侨，以至天津、上海、汉口等地的粤帮商贾，均想方设法在该地段及其附近购置屋地，建筑水磨青砖连檐房屋，即人们所称的“西关大屋”。甚至今逢源、宝源等地，原乃田塘沙地，也都将之填平以建造这些“西关大屋”。自是，这一地段，也就成了西关的著名住宅区。由于这一地段成了有钱人家的住宅区，他们寄望于“地灵人杰”，进入“文澜书院”以光耀门第者也就日多，从而文澜书院所得的资助也更丰裕。

文澜书院的成员，除富商巨贾及宦囊充盈或租尝丰裕的士绅外，其中也有生活是比较贫困的文士。他们当中有不少以开设学塾，充当塾师以维持生活。当时的学塾，有大馆和蒙馆两种。蒙馆较低级，只教学童读书识字；大馆，则有讲解、作文等课。当时西关的学塾（大馆）多租借文澜书院及湄洲会馆部分馆舍作馆址。其时，在文澜书院设馆的较为著名的大馆塾师，初有吕拔湖、梁冠林、洪景楠等人，稍后，则以甘巽卿最为有名。甘乃一科举生员（秀才），但对古文学造诣颇深，教授四书，孝经、左传、古文评注，以至诗词，均颇得学生的欢迎。目前广州一些知名的老中医，如甘伊周（原方便医院中医生）、甘少周（原市儿童医院中医生）、胡肇基（现荔湾区中医院顾问）以及名音乐家邓础铎（现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）等，都曾是他的学生。

文澜书院成员中生活较困者，除当塾师以所入维持生活外，另一些又在文澜书院以为学童开学、点主……或代人作院课等手段，博取些袍金、扇金、笔金之类以作生活补助之用。其以结交附庸风雅的穗、港、澳富商巨贾，代为撰文或

诗词，以博取这些商贾每年所送的“冰炭敬”，或以书法名家，专代人书写墓碑、寿屏、礼书等以博取若干笔润者也不少。这些仍可说是当日社会上的正绅通儒。至于那些倚恃他们是文澜书院的成员，勾结贪吏，收规庇赌，包揽词讼；甚或结交权贵，狐假虎威，借以猎取功名，以至为虎作伥者也有一些。由于他们每以文澜书院作为活动的场所，于是书院也不免于存在着被玷污的一角。

辛亥革命时期，文澜书院则又成了广州地区绅商促成广东独立“光复反正”活动的场所。广东省，尤其是广州，本是革命党人着力经营的地区。惟自1911年“3月29日黄花岗起义”以后，两广总督张鸣岐，水师提督李准等为首的清朝军政当局，加强了对革命活动的镇压和防范。革命党人在广州的活动，一时不得不控制下来。及武昌起义成功后，革命党也急谋发难。惟由于当时广州的革命力量薄弱，未能直接发动起义，遂将广东全省组织起来的民军，分成四支队伍，分头在各地起事，广东全省的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。面对着全省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，广州城内各阶层，各团体，均紧张地筹措应变。张鸣岐也暗中操纵上层士绅，企图“滑头自保”。十月二十五日，广州城内绅商各团体在文澜书院集会。张鸣岐的清乡总办江孔殷，操纵了这次集会，在会上提出了“广东提倡独立，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”的意见，通过成立改良政治总机关等决议。惟当时商界比较激进，对当日在文澜书院的集会，深致不满，因于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在爱育善堂另行集会，决议承认“共和政府”，同时选派代表向革命党人“宣达”。同日下午，商界各团体代表，在文澜书院再次集会，商讨“反正”独立事宜。在开会时有人树

起了“广东独立”的白旗，附近商店，并有悬旗挂灯以示庆祝的。张鸣岐得讯，虽立即派人扯去旗、灯，并逮捕了数名悬挂旗灯的商人，意欲将这些革命活动镇压下去。但由于当时多支民军，已从各地抵达广州，广东清政府当局也已发生了分化，曾镇压“黄花岗起义”的李准，看到“民心思汉，大势所趋”，表示愿意向革命党人投诚；江孔殷、龙济光等人也均劝张鸣岐顺应时势，早定大计，张鸣岐遂只好同意独立。十一月八日，以商界团体为主的各界代表，再在咨议局讨论独立问题，决定举张鸣岐、龙济光为正、副都督，于十一月九日宣布独立。由于张鸣岐“微服遁走”，龙济光也不敢出任副都督，各界代表于是重新开会，推胡汉民为都督，陈炯明为副都督，直到十一月中旬，才成立了广东军政府，正式“反正”独立。

辛亥革命后，文澜书院的“春秋二祭”仍旧举行，惟革命前穿戴衣冠翎顶，揖让升阶，翰苑两榜以上的大绅盘膝正座，举、贡、生员侧坐相陪的情状没有了。清末以至民初废科举，办学堂以后，中学专科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日多，加入文澜书院者日众，租项收入，渐已不足以应付活动所需，于是有人提出将其租项移作办学之用，结束“文澜书院”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济棠主粤时，政府始正式将书院租款，拨作省立第一中学（广雅中学）充作经费；书院的所有产权，亦概交政府处理。文澜书院于是也就结束。

文澜书院，计自清嘉庆15年（1810）建立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结束，共有120多年的历史。现下九路的“文澜巷”、“文澜新街”等街巷也是因文澜书院而得名的。

广州西关文澜书院的绅商活动（节录）

陈 曙 风

清末广东士流非尽趋维新派，亦绅亦商的集团也不少，如文澜书院是其一。文澜书院异于广东其他书院，不以讲学、分科设教、规定就学学子圈点经史，按时交课为务。徒袭书院之名，实则大小绅士聚集之俱乐部，与商董混而为一，与当时传统性之书院大异其趣。

文澜书院之设，初缘于清濠公所之余屋。今日太平南路以西及沿濠畔街一带为西关官濠，濠宽数丈，能通船只。日久为附近居民占用作屋地，渐至淤塞，水患堪虞。嘉庆年间，布政使曾燠准居民请求疏通濠道，以后为维持经常疏浚工作，于是有清濠公所之设。其时“洋商”有公产房屋一所，位于下九甫绣衣坊（即今日玉雕厂一带），乃由洋商捐出作为清濠公所所址。公所南端有屋三椽，辟为文澜书院。清濠公所责在挖濠，本与文事无关，然捐产者为洋商，而洋商为联络历届科场中式士子，书院于是产生。初由经销洋货大卢、潘、伍、叶四家，递年轮值管理。逢子、辰、申年由卢松兰堂当值，丑、己、酉年由潘敬修堂当值，寅、午、戌年由伍光裕堂当值，卯、未、亥年由叶日省堂当值。后来，所谓“文风日盛”，每年公推绅士十二人管理。“文风”不过设文会征文，设奖金奖录取者而已。其奖金等第为：第一名

银伍元，另奖绉扇洋巾；第二名三元；第三名二元；四、五名各一元，所奖绉扇洋巾俱与第一名同。第五十名至一百名则各奖白纸一刀而已。此外尚有贺新贵喜仪者，亦由书院致送，状元三十大元，榜眼、探花各二十六元，翰林八大元，主事、中书、知县各四大元，举人二大元，副拔优贡一大元，恩岁贡中元（即半元）。新中式人文澜书院者有一条地域性之规定：凡寓居西关须税业三十年后进庠入式，始得入院。但实际上入院之人亦有非居住该地域之内者。如许家则非世居西关，但以其经营商业于西关，亦作西关论。当时外洋归来之侨胞和广州之“洋商”多在西关，因此文澜书院渐为绅商聚集之地。粤省商会会长许芝轩，同时亦为文澜书院大绅。易兰生、张弼士、卢乃潼出现于总商会为商，出现于文澜书院则俨然大绅，干预社会事业。清末迫于形势，以“行宪”为名，其支持者即此等亦绅亦商之辈。

文澜书院之外，尚有清廷操纵士绅，所谓作“行宪”准备之广东省咨议局。凡选入局内者为议绅。议绅与非议绅中约分两派：一为梁鼎芬、邓华熙、钟锡璜、吴道镛、李庆莱、潘宝珩、陈如岳、丁仁长等，此辈多为致仕而归之京官，其中亦有居现职者。一为戴鸿慈、江孔殷、易学清、丘逢甲等。此等头面人物，其行藏如何，姑不置论，然皆足以左右当时视听。清廷思有以利用之，或拔为咨议局议员，或赋闲家居亦加以优礼。议长易兰生、当广东情势最紧张时，竟称病不出家门，亦不会客，其政治主张则为江孔殷所左右。当张鸣岐未正式宣布广东独立前，易在咨议局中仍斥革命党为“粤匪”，主张改良政治，认为不一定要实行革命。

大绅中不论好尚如何，类皆不思变亦不求新。惟商人组

织中则有总商会与粤商自治会之对立。粤商自治会为求新之商人组织，被总商会诋为不安本分者。总商会中成员另有剑庐俱乐部之组织，其中坚为张弼士、郭仙洲、俞海筹、曾耀廷、劳伟孟、许芝轩、罗少翺等均大富商。其中亦有杂工出身之陈惠普，具有新思想之商人唐拾义，及所谓小绅小商之李鉴诚等。他们多与文澜书院之省绅及总商会会长许芝轩不甚融洽。

反正以后，绅之名分不存（虽潜势力仍在）不得不转而为商。文澜书院亦不能保持所谓“文风甚盛”之局面。乃让出西边余地（一说原为“文昌庙”之地。文昌庙之司祝，在有科举时候收入甚丰。盖以文昌、魁星能司中式，士子多奉之。及科举废，文昌帝君遂受冷落，文昌庙亦典与商人）拆建为文园酒家。文澜书院中人感慨系之，撰联以志其慨，联云：

“文风未许随流水，园地于今属酒家。”书院与酒家相连，书院西厅门通酒家，可将筵席端至西厅款客。大绅钟锡璜中落后，辟其私宅为“集雅园”，继而改为“漠觞”，乃园林式酒家（今为宝华路之银龙酒家），开灯虎、诗钟等文会，盛极一时。酒家之名亦以是而传遍遐迩。文事成了招徕手段。

清末民初活动于文澜书院的大绅，以江孔殷为最著。江孔殷，南海人。由于他在清时曾被点为翰林，人们多尊称之为江太史。又因其别号霞公，俗又多讹称之为“江虾”。清末因江身为太史，督抚等俱礼之。清代封疆大吏接见太史，官衙例开麒麟门（中门）延入。粤督张鸣岐、提督李准为镇压革命，认为收拾地方乱状，非起用地方大绅不可，对江更为优礼，乃擢江孔殷为清乡督办。清乡时，江对张鸣岐每夸

大社会动荡情势，表示熟悉地方情形以坚张信任。在文澜书院中则交结耆旧，如贵州巡抚致仕归之邓华熙等以自重。

辛亥革命后，大局甫定，其时为军政府秉政，江仍欲以省绅身份周旋于军政府中，并拟靠故旧胡衍鄂（胡汉民之兄）的关系，欲于军政府中占上一席。由于民军李福林辈的反对，因而未果。1911年（民国元年）以后，江置身于工商业，取得了官督绅办之广州电灯厂董事长一缺，继充英美烟草公司之华南总代理，操起买办业务，以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相对抗，曾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度受其影响不少。



关于西来初地和古之花坞

谢 仰 虞

一、关于达摩东来及西来初地

西来初地，在今广州荔湾区下九路，盖因此乃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从印度泛海来至广州登岸之地，故名。

菩提达摩之从印度泛海东来至广州，虽有人说在汉武帝时，但各有关文献及专家论著，均谓事在南朝梁武帝时。清道光二十九年华林寺开山碑记，更明确记事在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（527年）。

佛教传入我国始于何时，说法不一，惟史家多认为《三国志·魏志》卷三十，裴松之注引鱼豢《魏略·西戎传》所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，即公元前二年，汉“博士弟子景卢（《魏书》作博士秦景宪）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。”为佛教传入中土的开始。北齐魏收《魏书·释老志》依《汉武故事》虽谓汉武帝元狩中（公元前122—117年），曾遣霍去病讨匈奴，获休屠王金人，帝以为大神，列于甘泉宫，烧香礼拜，为佛道流通之渐。惟《汉武故事》，乃南朝刘宋王俭托名班固所撰，史家多认为内多伪托臆测之词，不足凭信。

菩提达摩，南天竺（印度）国人，据说乃香至王的第三子。于我国南朝梁武帝时，从印度航海东来，历经三载，始抵达广州，于广州古之绣衣坊码头登岸（绣衣坊，或作锦绣坊，在今下九路西来正街）。时广州刺史萧昂，一面让其在广州设坛传教，一面表闻于梁武帝萧衍，梁武帝得知后，即

派遣使者迎至建业（今南京），与之研讨佛经，惟“机缘不契”，达摩乃离去，于是“一苇渡江”，至河南洛阳，入嵩山少林寺结坛传教，面壁修行，时人称之为壁观婆罗门。至梁大同元年（535年）去世。

达摩尝自称为印度佛教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。他的东来，在我国弘扬了佛教的大乘禅法（禅学），为我国佛教禅宗的创立，起了重大的作用。唐时被谥为圆觉大师，后并被尊为我国禅宗的初祖（我国禅宗，初以求那跋陀罗为初祖，达摩为二世。及禅宗的南宗流行后，达摩始被尊为初祖）。人们为了纪念他，乃于其在广州登岸的地方，建了一座“西来庵”，（庵，一说乃达摩于梁大通元年即527年到达广州后所手建），庵于明时已颓败，清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，改建为华林寺。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年），于寺内用肇庆星岩白石添建了一座高一丈六尺的石塔。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又添建了一座五百罗汉堂。其时，寺正门在今长寿西路新胜街旁，后门在下九路西来正，东至今新胜街，西至今毓桂坊，占地二万八千多平方米，为广州四大名刹（光孝、六榕、海幢及华林）之一。寺址周围，人们因称之为“西来初地”或“华林街”。今西来初地内的西来正街、西来西街、西来北街以及华林前街、华林北街、华林新街……均由此而得名。

或以为西来初地之得名，乃因达摩是“西方”佛教徒泛海来至广州的第一人，以是，西来初地，即“西方”佛教徒最早来至广州登岸之地的意思。按“西方”佛教徒之最早来至广州而有记载可考者，乃天竺僧耆域而非达摩。耆域于西晋初年（266—274年）即已泛海到扶南（今柬埔寨），然后经由交州（今越南北部）来至广州。到广州后，随而取道襄阳前往

洛阳，为人医病。据说，他能劈开病者脑袋，“除诸虫”，又能剖开病者肚皮，“扭转肝脏”（见《持女耆域因缘经》），医术十分高明，有“神医”之称。后因洛阳兵乱，始回归印度（见《高僧传》卷九、张星烺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及中国佛教协会《中国佛教》第一辑）。惜其在广州的事迹，无可考。又据《广东考古辑要》，谓于西晋太康二年（281年）已有印度僧人迦摩罗从印度来至广州，并于今海珠中路西侧上果里兴建了“三归王仁寺”（转据87年9月20日《广州日报》邓端本《广州早期的佛教传播》一文，参阅徐俊鸣、郭培忠、徐晓梅合著《广州史话》，“三归王仁寺”，《广州史话》作“仁王寺”）。其后，“西方”佛教徒比达摩早至广州而较著者，有罽宾（今克什米尔）僧昙摩耶舍。他于东晋隆安中（397至401年）即已来抵广州。住白沙寺，善诵毗婆沙律，译出了《差摩经》一卷，并兴建了广州王园寺（光孝寺前身）大殿五间。其后，北至长安与另一沙门昙摩掘多，共译出佛经多卷，又游化江陵，宣传佛法，至南朝刘宋元嘉中（424至452年）始辞还西域，在我国为早朝著名的佛教译经师之一。他之来抵广州，计比达摩早一百多年。此后，“西方”僧人之泛海东来至广州而又较达摩早者，可谓代不乏人。如南朝刘宋文帝时，则有罽宾僧求那跋陀，经狮子国、阁婆国来至广州，后于元嘉八年（431年）正月，到达建业，住祇洹寺，译出《菩萨善戒》等经十部十八卷。于元嘉十二年（435年），又有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，经狮子国泛舶来至广州。刘宋朝廷遣使迎至建业，住祇洹、东安等寺，前后译经五十二部一百三十四卷，至为繁富。又尝弘扬禅法，曾被尊为禅宗初祖。于南齐时，则有中印度沙门昙

摩伽陀耶舍，于建元三年（481年）来至广州，并在广州朝定寺（朝定寺，一作朝亭寺，或谓即光孝寺）译出《无量义经》一卷。又有伽跋陀罗于永明七年（489年）来至广州，并在广州竹林寺译出《善见律毗陀沙》十八卷。……他们之来抵广州，均比达摩早数十年。其将印度的菩提树带来移植于王园寺（光孝寺）的智药三藏，于南齐和帝中兴二年（502年）已来至广州，亦比达摩早来二十五年。可见达摩并非“西方”僧人泛海来至广州的第一人。只因上述各人，除曹域、迦摩罗二人传播佛教事迹未详于著录外，其余虽都曾翻译佛经，弘扬佛法，尤其是求那跋陀罗，但对我国佛教发展流传的影响和作用，拟诸达摩，均远不可及，用以声名未著，甚或不大为人们所知晓而已。以故，西来初地之得名，虽与达摩有关，但并非因为他是“西方”佛教徒泛海东来至广州第一人的缘故。

至谓西来初地得名的由来，乃因这是古时“外国人初至广州的一个贸易中心”（见《广州若干街名的由来》）。此说似亦未确。按，绣衣坊码头一带，虽乃我国古时各地海船和海商聚集之地，惟若说它已是古时“外国人初到广州的一个贸易中心”，于史似尚无据。纵或已是个对外贸易的“中心”，如上所曾述，这应也不是“西来初地”得名的由来。

二、关于西禅寺及“古之花坞”

或谓达摩于汉武帝时，到达广州后，曾路过西禅寺前往泮塘散发“泮塘五秀”（马蹄——荸荠、茨菇、菱角、茭笋、莲藕）种苗，栽种于泮塘的“古之花坞”。

按，西禅寺（即龟西峰禅寺、西华寺。在今西华路金花街内兴起里西边，现已不存），乃始建于南汉刘铤大宝元年

（958年），所谓“泮塘五秀”，据故老相传，谓原乃西禅寺僧作为四时供奉佛前蔬果品而种植于寺前池塘内的。西禅寺既于南汉大宝元年始建，则“五秀”之移植于泮塘，最早恐亦是宋时情事，可见上说未为得实。

至于泮塘的“古之花坞”，或谓乃秦汉时（“在南越王时”）开辟，并已“是个颇具规模的花园”。

按，古代广州地段珠江江面，颇为辽阔。江中曾有多座石质小岛。其最著者为海珠石、海印石及浮邱石。浮邱石，在“老城西门外”，即今中山七路陈家祠附近。宋以前，它还是个“海岛”，岛旁“泊船无数，石上篙痕宛然”。（见《南海县志》、明黄佐《广东通志》、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、及清仇池石《羊城古钞》）。据此以推，唐以前今泮塘一带，即“广州郊西，自浮丘以至西场，自龙津以至蚬涌，周回廿余里”（《广东新语》），应仍是珠江的“海面”，或是近岸的一些沙洲小屿。现泮塘东北一带，尚有澳口、南岸、及龙津西路恩洲等地名可资证。据世居澳口的一位友人蔡老先生说：澳口，旧称南船澳，一般人又多称作涌口。澳口，乃合南船澳与涌口两者的简称。听先辈说，澳口，原乃江边修理船舶的一个坞澳，尚非平陆。现南海县的横沙、沙贝等地，前时也是珠江江中的沙洲。至于何时才淤积成为平陆，年代已难确断，估计应属唐宋以后的事。邹村崩岗（即松洲岗），乃是澳口附近唯一的一个小山岗的旧迹。澳口，旧属南海县浔峰社恩洲堡，乃十八乡之一。归属广州后，曾为鱼栏街的一部分。据此以推，距今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，今泮塘一带，应仍是个水乡泽国，似不可能是个平陆，并开辟有个“颇具规模的花园”——“花坞”。

“古之花坞”，或据《广东新语》谓为西汉“陆贾之所经营”。说似可商。按，陆贾当年在泥城（在今广州西场）纵或经营有“花坞”，惟似非近世所称的“古之花坞”。“古之花坞”，故老习惯称之为“刘王（或刘氏）花坞”。所谓“刘王（氏）”，乃指南汉刘氏，而非指西汉刘氏。据世居泮塘的一位友人李先生说：泮塘曾有闸门楼一座，在今“荔湾湖公园”门前附近。闸门上有石门额一方，题为“昌华故址”。门前有石刻对联一副，联云：“稼穡是生涯，耕雨锄云，蓑笠影忙花坞里；诗书为乐业，囊萤映雪，弦歌声彻泮溪中”。又谓于今泮溪酒家旁边的“风水基”，旧有石碑一方，题为“古之花坞”。上项闸门楼、门额、对联及石碑，少时犹及见。拆除后，未知去向。近闻“古之花坞”及闸门楼（“昌华故址”）的门联之一等碑石，曾在梁家祠街涌边“文塔（即云津阁）”附近发现，现存何处，未悉。据此，可知所谓“古之花坞”，乃在南汉时建的“昌华苑”内，而非在陆贾所经营的泥域。

